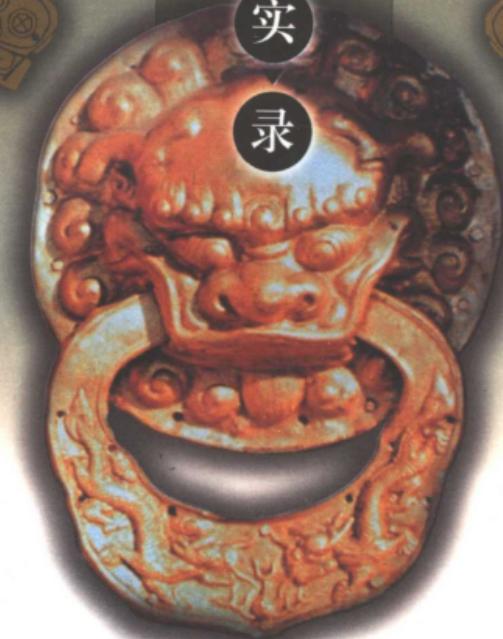


中
国
历
史
实

录

七巫国之乱
蛊河阴之祸
敬石海变
陵塘政叛
藩之乱



中国叛乱实录

刘志义 主编

齐鲁书社

中国历史实录



中国叛乱实录

刘志义 主编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叛乱实录 / 刘志义主编 . - 济南：齐鲁书社，1999.9
(中国历史实录丛书)

ISBN 7-5333-0810-7

I . 中… II . 刘… III . 历史事件 - 中国 - 古代 - 通俗读物
IV . K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IC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2002 号

中国叛乱实录

刘志义 主编

*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25 印张 2 插页 377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33-0810-7
K·234 定价：23.00 元

前　　言

刘志义

四月天山路，今朝瀚海行。
积沙流绝塞，落日渡连营。
战伐因声罪，驰骋为息兵。
敢云黄屋重，辛苦事亲征。

清朝康熙年间，中国西北地区的割据势力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点燃起叛乱的战火。为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康熙亲率大军，三临漠北，前后历时八年，平定了噶尔丹叛乱。上面这首五言诗就是康熙在出塞亲征的途中写下的，抒发了一代君王铁马金戈、雄奇豪迈的气概。

政变与叛乱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很有特点的历史现象。中国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其中

不乏值得向世人夸耀的辉煌篇章。但无庸讳言，一部中国封建史，也是一部浸透着血与火的惨痛历史。翻开浩繁的史籍，字里行间不时散发出令人窒息的血腥之气。一次次黄袍加身，一顶顶王冠落地，与国祚倾移、江山易主相伴随的往往是弑夺、篡位、屠杀、掳掠……叛乱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如同附着在君主专制肌体上驱之不散的幽灵，与整个封建社会相始终。

为了阐明导致叛乱频仍的根源，这里需要补叙一些历史背景。夏以前的社会状况，我们所知甚少。那时的黄河流域似乎是一片令人悠然神往的祥和乐土。当时部落联盟的领袖由各氏族共同推举，据《尚书·尧典》记载，尧年老退位时，没有传位其子丹朱，而是传给众望所归的贤者舜；舜晚年同样选贤传位，被推举的是禹。这种继承方式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禅让”制度。孔子曾以称赞的口吻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但到了禹退位时，继承者却不是众人推举的伯益，而成为禹的儿子启。这标志着最高统治者新老交替的方式已开始由“禅让”向世袭，亦即由传贤向传子过渡，由此开创了“父传子，家天下”的局面，从而诞生了奴隶制王朝——夏。这种变化绝非偶然，历史的逻辑本该如此。权力的更迭和财产的继承是紧密相连的，世袭制的产生和发展同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息息相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私有制国家形态夏朝的建立揭开了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序幕。

君主专制政体的特点是皇权高于一切，“朕即国家”，“家国一体”，皇帝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天下财富尽归皇帝所有。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力欲是人类基本的天性之一，权力越集中，便越具有诱惑力。封建时代至高无上的皇权，自然成为众多政治野心家竞相追逐的终极目标。然而，在专制制度下，在位君主没有任期限制，帝位的更替形式为父死子继，皇位的终身制与世袭制造成君权转移的范围极为狭小，非皇家血统者自然无缘问津，即使皇族子弟，非太子亦不得染指。由于缺乏皇

位向“龙子龙孙”以外的人转移的合法途径，那些觊觎王位而又拥有实力的人物通过暴力或阴谋夺取王位也就不可避免了。

再者，在私有制社会里，权力是贪欲的催生剂，而没有任何约束机制的君权必然带来自身的高度腐败。遍数中国历代皇帝，开明、勤政、恤民者为数不多，而暴虐、荒淫、昏庸者比比皆是。昏君在位，朝纲紊乱，国事焉得不废？而各类矛盾的激化自然给野心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借此制造动乱，于乱中夺权。正如清初唐甄所说：“帝室富贵，生习骄恣，岂能成贤！是故一代之中，十数世有二三贤君，不为不多矣。其余非暴即暗，非暗即僻，非僻即懦。……懦君蓄乱，僻君生乱，暗君召乱，暴君激乱。”黄宗羲也曾严厉批判“家天下”的君主世袭制：“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由此可见，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封建时代政变与叛乱层出不穷、愈演愈烈最主要的根源。

二

本书所记述的是自秦汉迄至清代历朝统治阶级内部因权力之争而发生的政变与叛乱。就具体内容与特点而言，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种类型。

其一，王室内乱，骨肉相残

《红楼梦》中的探春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咱们倒是一家人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鸟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借用这段话描述宫廷之中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殷商时期，世袭制由“兄终弟及”向“父死子继”过渡，到周公时，为避免王室内部因争夺皇位而引发动乱，规定了嫡长子继承制，皇太子是皇位的法定继承人，一旦皇帝驾崩，太子即可即位称帝。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权力交接的相对稳定性。然而皇帝后妃众多，俗话说“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并非夸大之词。众皇子虽有嫡庶之分，但皇帝亲疏有别，爱屋及乌，

储君之位产生争议也是常有的事。围绕皇位继承，皇子之间勾心斗角，相互猜忌，视如寇仇，兄弟相争血溅宫门的惨剧历代皆见。隋文帝的五个儿子皆为独孤皇后所生，自幼相亲相爱，文帝为此颇觉欣慰，曾夸耀说：“前世天子，溺于嬖幸，嫡庶分争，遂有废立，或至亡国。朕傍无姬侍，五子同母，可谓亲兄弟也，岂有此忧邪！”然而文帝高兴的太早了，权力的诱惑使兄弟亲情荡然无存。杨氏兄弟为争储位相互残杀，最终皆死于非命。文帝自己也未得善终，杨广为抢班夺权，乘文帝病危之际暗施杀手，“血溅御屏，冤痛之声闻于外”。

“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一首世人皆知的七步诗道出了宫廷内兄弟之间同室操戈自相残害的内幕，倾诉了无辜受戮者的满腹哀怨、一腔悲愤！皇宫的高墙内表面上歌舞升平，金迷纸醉；暗地里磨刀霍霍，杀机四伏。贵为皇室胤胄，而欲享平民之乐，又何其难也！曾有一位年仅十岁的皇子（南朝宋孝武帝刘骏之子刘鸾）在被其兄杀戮时发出“愿来世不生帝王家”的哀叹，王室内乱的惨烈于此可见一斑。

其二，外戚专权，纂乱天下

外戚擅政是宫廷内乱的又一根源。世袭制往往导致幼主临朝，母后听政，这就为外戚独揽大权提供了契机。外戚利用其在宫廷内的特殊地位扩张势力，进而挟制君主，专擅朝政。外戚专权是封建政治的一大特色，又以两汉时期最为典型。东汉章帝年幼即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其兄窦宪得以独揽朝政，“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刺史守令多出其目”。质帝在位时，外戚梁冀窃取国柄，专横无忌，玩皇帝于股掌之中。质帝少年气盛，忍无可忍，私下里责骂梁冀为“跋扈将军”，不想一言不慎，惹恼梁冀，竟招致杀身之祸。“母后临朝，未有不乱者”，而外戚专权，结果必然是纲纪废弛，国无宁日，最终往往酿成亡国之祸。

其三，宦官乱政，擅兴废立

宦官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下产生的一个怪胎，其篡乱朝政较之外戚有过之而无不及。宦官说起来不过是皇帝的家奴，身份十分卑贱。但“任人唯亲”是封建社会的通病，宦官终日侍候皇帝起居，自然容易得到主子的宠爱。特别是外戚与权臣一旦势力过度膨胀，势必对皇权构成威胁；而宦官作为阉割过的“刑余之人”，是绝对不可能当皇帝的，这就使皇帝在倚重宦官时有了一种安全感，宦官由此途径进入了政治领域。

宦官乱政的朝代有秦、汉、唐、宋、明，尤以唐代为烈。唐玄宗时让宦官组成内朝，协助他处理政务，后来发展到任用宦官执掌枢密，统帅禁军并外出监军，权重一时，势力显赫。因为宦官自身无望蹑足九五，擅自废立皇帝就成为其篡政夺权的拿手好戏。宦官凭借手中的权力，俨然成为皇位继承的裁决人，制造了一起起立帝、废帝甚至弑帝的宫廷内乱。晚唐八位皇帝，有七位为宦官所立，昭宗为宦官所废，宪宗、敬宗则被宦官弑杀。唐僖宗在宦官面前俯首帖耳，唯唯诺诺，称宦官田令孜为“阿父”，实际上已沦为听凭摆布的政治玩偶，宦官则成为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太上皇，下陵上替，至此而极。

其四，异姓夺权，改朝换代

皇室宗亲为争夺王位尔虞我诈，互不相让，殊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朝中那些贵族官僚和权臣悍将受权力的诱惑与野心的驱使，也对皇位垂涎三尺，时刻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他们或凭借其“世代簪缨”，或依仗其赫赫战功，处心积虑地罗致亲信，诛除异己，一步步扩大自己的权力，待羽翼丰满，势力足以与皇帝分庭抗礼，则形成逼主之势。如东晋初年，军政大权掌握在世家大族王导、王敦手中，当时即有“王与马（司马），共天下”的说法。而在位皇帝一旦大权旁落，江山易姓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王莽是中国历史进入封建社会后第一个篡位者。《汉书·王

莽传》详细记载了王莽权力增长的过程。王莽以外戚拜为大司马、大将军后，先后清洗了傅、丁两家外戚势力，铲除了公孙闳等反对派，成为一手操纵西汉朝廷的铁腕人物。为了清除篡位的障碍，王莽残忍地毒杀了14岁的汉平帝，于公元8年宣布“改正朔，易服色”，刘姓汉朝改成了王姓新朝。

值得指出的是，自春秋战国时起，传说中的“禅让”进入了现实政治领域，变化出光怪陆离的景象。篡位者往往祭出“禅让”这一法宝，即以“禅让”为名，行篡政之实。王莽是这种夺权手法的始作俑者，以后魏王丕、晋司马氏、南朝宋刘裕、齐萧道成、梁萧衍、陈陈霸先、北齐高洋、北周宇文觉、隋杨坚、唐李渊、后梁朱温等，都竞相仿效，上演了一幕幕“禅让”的闹剧。改朝换代的斗争每每以“禅让”为美丽装饰，其中不无讽刺意味。

其五，地方割据，兴兵作乱

中国封建制度的特点是高度中央集权，这有利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但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自秦始皇第一次在疆域广袤而交通落后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之间始终存在着双重的微妙关系：中央政府一方面为巩固统治，要借重地方力量，所谓“藩岳作镇，辅我京师”；另一方面又担心地方权重难制，尾大不掉，与中央政府抗衡。事实上在整个封建时代，中央与地方即“干”与“枝”之间的矛盾时起时伏，或激或缓，始终存在，地方实力派人物兴兵作乱的事件也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地方行政权与军事权合二为一时，“即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俨然是国中之国，根本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王权稳定强大时还能通过宗法关系或强有力的政治手段维系大一统局面，彼此相安无事；一旦皇帝昏庸懦弱，权臣干政，中央政府腐朽败坏，则地方势力起兵叛乱就只是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了。

地方割据势力在发动反对中央政府的兵变时，往往打出“清君侧”的旗号，以使自己的行动师出有名。西汉吴楚七国叛乱，即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借口，成为清君侧的滥觞；安禄山叛唐，也以请诛奸臣杨国忠相标榜，这自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明初建文皇帝有感于诸王各据一方，“拥重兵，多不法”，遂与大臣齐秦等谋议削藩。燕王朱棣早就预谋夺位，即援引明太祖朱元璋关于藩王有权向朝廷索取奸臣的“祖训”，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经过三年多的战争，夺取了皇位。

三

政变与叛乱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不可低估。“叛乱”是一个贬意词，中国历代史学家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将所有以下犯上的政变一概称为“叛乱”，本书虽沿用了“叛乱”一词，但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封建时代的叛乱通常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旧史书将历代农民起义均斥为叛乱，对此我们自然不会认同，所以在撰写此书时，中国历代的农民战争不在作者的视野之内），多属“春秋无义战”，胜者王侯败者贼，就其性质而言，未必有多少大是大非可说；而就其后果而言，则需做具体的分析。既然是叛乱，自然带有浓厚的暴力色彩，很难做到兵不血刃（当然也有例外）。每一场政变，几乎都伴随着血腥的杀戮。宫廷政变波及的范围相对有限，而地方势力的叛乱往往造成深重的历史灾难。西晋八王之乱，持续达十六年之久，难以计数的百姓直接死于战乱，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北中国陷入分裂之中，严重阻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晋书》论述八王之乱的危害时说：叛乱迭起，“遂令神器劫迁，宗社颠覆，数十万众，并垂饵于豺狼；三十六王，咸陨身于锋刃，祸难之及，振古未闻”。另一个典型事件是唐安史之乱，使盛极一时的唐王朝由盛而衰，在其后的藩镇割据的战乱中走向灭亡，造成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分裂对立局面。

然而，丑恶的历史也自有其发人深省之处。个人权力欲的恶性膨胀固然是引发叛乱的直接动因，而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从各自利益出发，企图通过夺取最高权力来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得以付诸实施，从而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则不可一概而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叛乱有时能发挥调节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功能。特别是在社会长期分裂割据的情况下，随着江山易姓，政权更迭，往往使社会危机得到相对缓解，由大乱走向大治。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得政权，建立宋朝，结束了自唐末以来群雄竞逐、四海鼎沸的局面，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以恢复和发展，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部《二十五史》，堪称世界各国有史以来最系统、最完备的史书，其中记载了历代的政变与叛乱不下数百起。本书选取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 28 起，按年代顺序编排，以叙事为主，间有言简意赅的评论。本书的宗旨是“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力求为读者提供一部内容丰富、真实可信的历史普及读物。考虑到本书的受众是一般读者而非专家学者，行文尽量做到清爽简洁，通俗流畅，不作繁琐考证，一般也不使用艰涩难懂的引文，对少量简明易懂的引文，亦不注明出处。有道是“读史使人明智”，我们编撰此书的目地在于使读者对中国历史上的政变与叛乱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善于思考的读者或许能够从中获得某些有益的启迪，发现历史发展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倘能如此，则读者幸甚，作者幸甚，也不枉费此书众多撰者的一番辛劳。

另需说明的是，本书成于多人之手，体例与风格不尽统一；且限于水平，成书仓猝，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我们真诚的期待着读者朋友的批评指正。

1999 年夏于玉枕山房

目 录

1

目
录

前言	刘志义	1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		
——异姓王之乱	1	
“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诸吕之乱	11	
济北、淮南警先起		
——济北王、淮南王之乱	17	
“请诛晁错，以清君侧”		
——七国之乱	21	
大势已去徒余响		
——淮南王、衡山王谋反	37	

骨肉相残为猜疑	
——巫蛊之祸	42
垂涎帝位落自缢	
——燕、盖谋反	58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董卓之乱	63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司马氏代魏	73
“朝官伏尸南风悍，黔首涂炭八王师”	
——八王之乱	89
铁骑踏尽公卿骨	
——永嘉之乱	103
“王与马，共天下”，共乱了一代朝纲	
——王敦、苏峻之乱	116
“不能流芳百世，也当遗臭万年”	
——桓温父子之乱	125
宫廷喋血，历代罕见	
——石虎父子即位之乱	139
淫乱不法长河怨	
——河阴之变	157
一梦招得萧梁灭	
——侯景之乱	173
手足相残，血溅宫门	
——玄武门之变	190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安史之乱	208
为圆女皇梦，同赴黄泉路	
——韦后、太平公主之乱	234
甘露谋败，党人流血	
——甘露之变	250
遗臭万年的儿皇帝	
——石敬瑭之叛	266
“将帅权倾皆易姓，英雄时至忽成名”	
——陈桥兵变	287
“我心正与君相似，只待云梢拂碧空”	
——海陵政变	310
同室操戈，争权夺位	
——海都、乃颜之叛	328
封藩遗祸，成祖夺位	
——靖难之变	344
兄弟阋墙，刀光剑影	
——夺门之变	400
扑朔迷离的宫廷内乱	
——晚明三案	428
康熙戡乱，维护统一	
——三藩之乱	453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

——异姓王之乱

刘邦在楚汉战争中，面对强大的对手——西楚霸王项羽，屡屡败北。为了团结各方力量、笼络一些有实力的将领齐心协力共同对付项羽，刘邦先后分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他们是：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这些诸侯王占据了西汉王朝的大片土地，俨然独立王国，而且他们之中大都是能征惯战的骁将，所以对中央政权、对刘邦的皇位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而刘邦当初分封他们就是权宜之计、迫不得已，现在江山已定、大业已成，自然应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一有机会就要剥夺他们的兵权，消灭他们。这些异姓诸侯王也大都怀自危之心，随时准备反叛。所以地方诸侯势力与中央皇权之间的矛盾冲突日趋尖锐，最终导致了异姓诸侯王叛乱不

断，烽烟四起。诸侯王中，最早公开叛乱的是燕王臧荼。他本是故燕国大将，先被项羽封为燕王，后叛楚降汉，仍被刘邦封为燕王。但臧荼对布衣出身的刘邦却心有未服。汉五年（前202年）七月，刘邦刚刚登上皇帝的宝座，臧荼就发动了叛乱，刘邦亲率大军前往平叛，叛军很快土崩瓦解，到九月叛乱即告平定，臧荼被俘。但刘邦还未喘过一口气来，第二年韩王信又公开叛变，投降了匈奴，刘邦又亲率大军征伐。而接下来，则是七个异姓诸侯王中势力最强大的楚王韩信了。

一、一代枭雄化肉酱

韩信（？——前196年），江苏淮阴人，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他出生于贫穷之家，并且父母早亡，所以少年时只好流浪乞食。他曾在一个亭长家里混饭吃，亭长的妻子很讨厌他，于是便提前吃饭，使韩信来了后吃不到饭。韩信很生气，就再也不去了。后来，他又蒙一个在河边漂洗丝絮的妇女把自己食物分给他吃了几十天。韩信虽然如此落魄，但却有大志向。母亲死时，他穷得连埋葬的钱都没有，却选了一块又高又宽敞的地方作为母亲的墓地，以便自己发迹后可以在旁边“置万家”守墓。有一个年轻力壮的无赖当众侮辱他，让他从胯下钻过，他竟能强忍耻辱，从其胯下钻过。这就是著名的“胯下之辱”。

秦末大乱，群雄并起，陈胜、吴广首倡起义，楚国故将项燕和侄儿项羽也起兵响应。韩信听到消息，带剑投入项羽军中，希望能建功立业，但始终未受到重用。于是他又改投刘邦，但开始也未受到重用。韩信曾与萧何交谈，萧何很赏识他，但刘邦仍未重用他，于是韩信又偷偷地逃走了。萧何听到消息，连夜追赶，将韩信追回。这就是著名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刘邦一开始误以为萧何也逃走了，后来知道是为了追赶上一个小小的韩信，很生气。但萧何极力向刘邦推荐韩信，声言

如果刘邦要想得天下，就非得重用韩信不可。刘邦听从了萧何的建议，选择了一个好日子，筑坛场，拜韩信为大将。从此韩信得以施展才干，成为帮助刘邦打天下的最得力的将领。

在韩信的建议下，刘邦于汉元年（前 206 年）八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东进定三秦，夺取了关中，走出了与项羽争天下的关键的第一步。第二年，刘邦兵败彭城，死伤二十余万人，自己仅率几十骑逃脱。在这关键的时候，韩信收拢散归之兵支援刘邦，阻止了项羽的西进。彭城之败后，诸侯们纷纷叛汉投楚，其中以魏王豹对刘邦的威胁最大，所以刘邦便派韩信击魏。韩信采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战术，在正面集中船只，摆出渡河的架势，却暗暗集中兵力用木罌缶（一种口小肚大的容器）从侧面抢渡，大举破魏，俘魏王豹，又乘胜破代，不仅解除了刘邦的危机，而且将收编的魏、代降兵和自己的精兵送到前线，使刘邦恢复了元气。

汉三年（前 204 年），韩信又率 3 万兵马“背水一战”，大破赵军 20 万，随之又不战而平定燕地。而此时刘邦又为项羽所败，损失惨重，韩信再次把精兵交给刘邦，使之势力复振。随后韩信东进攻齐，攻下齐都临淄，项羽派兵 20 万救齐，而齐兵也尚有 20 万。韩信与敌隔江对峙，他派人用沙袋连夜堵江断流，然后佯攻敌人，诱敌渡河，放水冲之，将敌人分隔成两半，大破敌军，平定了齐地。这时的韩信，兵多将广，战功显赫，势力强大，在项羽和刘邦争夺天下的格局中举足轻重，他倒向那一方，天平就将向那边倾斜。项羽看到这一点，于是派使者去劝说韩信反叛刘邦，自立为王，与刘邦、项羽形成三分天下之势。但韩信此时正受刘邦的重用、信任，被授予上将军之职，统率数万之众，而且刘邦对他言听计从，所以他拒绝了项羽的建议。这时有一个叫蒯通的齐国人也看出了韩信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前往游说韩信。他以春秋时越王勾践与谋臣范蠡、文种等事为例，认为韩信功高震主，有“走兽尽而猎狗